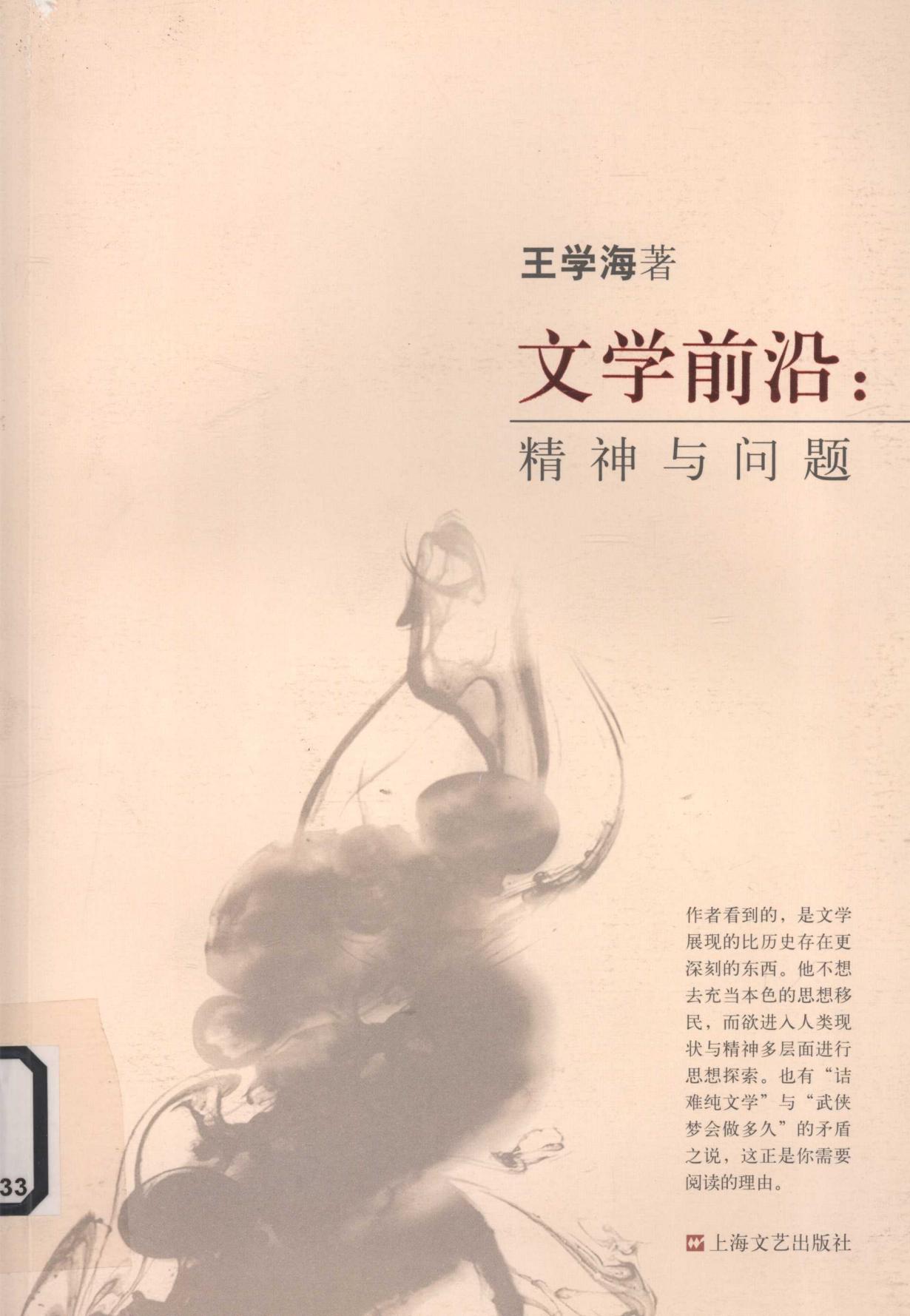


王学海著

文学前沿： 精神与问题



作者看到的，是文学展现的比历史存在更深刻的东西。他不想去充当本色的思想移民，而欲进入人类现状与精神多层面进行思想探索。也有“诘难纯文学”与“武侠梦会做多久”的矛盾之说，这正是你需要阅读的理由。

■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王学海著

文学前沿： 精神与问题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前沿：精神与问题 / 王学海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321-4130-2

I . ①文… II . ①王… III . ①文艺理论-文集

IV .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1953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特约编辑：士 华

封面设计：王志伟

文学前沿

——精神与问题

王学海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277,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30-2/I · 3182 定价：3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焦虑与期待(代序)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识与求问

A

中国作协的现首领铁凝曾在一次访谈中说：“中国作家协会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钱，而是那些灿烂的作家群。”^①需要延伸的是，应该说中国作协最宝贵的是作家的名声。至于如何看待灿烂的作家群，当然不能仅靠一双平常的眼睛，因为灿烂同时也是杂色的。顺此思路，如果以非平常的眼睛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说，中国的当代文学，正处在心理的挣扎期。作家们以及评论家们，都已经隐约感觉到，文学的发展，不能不要这个已经营造了近百年历史的新文学的巢穴，但发展的步伐，又不得不迫使你必须走出这个以历史眼光来看还尚为年轻的“旧窝”，以谋求更新的发展。这就像过去是仓储，现在是物流一样，流动性的增大与旧方式的变新，正是在无意识的探索与冲突之中诞生的。走出旧有的巢穴(新文学虽年轻，但时代快节奏于它来讲将是一种必须随变的积极应对)，文学打破原先苦心建造的宫殿往外走，是否就又会有某种不安的焦虑感。而事实也正如此，市场化使文学分裂出准文学，以及嫩稚又热卖的最文学类新造的市场文学。它们既貌似在重新壮大文学，但实质却使文学失却了原先优雅的内涵。当下文化的趋势推着文学向商业与浅阅读的非文学世界靠拢，所以尽管这样的文学还在继续和发展，但那份独特的价值个体的生命体验已游离于文学之外，也无法获取这个变革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其实，文学之质与社会之义是有内在理路与必然联系的，文学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它是反映社会深度的语言意象的文化表征。

一个时代变迁的审美意趣对于文学创作，就是普遍经验之中的深刻开掘，也

^① 《南方周末》2011年1月4日。

2 文学前沿：精神与问题

即个体生命体验的普遍性领悟中去达臻的深度与高度。社会人群之于文学人物形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于文学,是人文理性之于文学的另一面。由此以文学的只眼去体悟、觉察、焦虑,甚至创伤等等,那种动态的宛如来自深海底部理性与非理性的回旋与冲腾,那种光照之下或风暴之中的情绪的抒发,在 E 时代人重新被结构(物质生产的与文化生活的),他们的社会形象也被重新在型塑,主体与反主体之间产生的新人与新的人群,及由此时代之影响或随之感染后的那份真切又如拎揪人类灵魂之线的收缩与舒张,便会由它带出整个时代症候的灵魂的呼喊的那种大文学作品,可惜于今尚未真正出现。

随着高科技带动社会飞速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危机与社会的冲突便日益增强,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必然具有个人主动参与人类正在前行着的历史的当下性。也就是说,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是作者通过思考当下,回顾过去,探索未来之自我意识与自由创作引发作品审美内涵的增强,从而导致作品自身参与正在朝前发展的人类的历史,用笔说出人们于日常生活中正在感受与磨砺的东西。市场经济的林林总总,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已成神话,但新的危机又在不断出现的社会现实面前,作家们及其他他们自己生养出来的作品,要追求的当然是一个非资本主义旧有的未来(西方资本主义不尽人意之种种,早早存在于国人的眼前),为此,他们与作品面临的将是认真又敏锐地去重新思考时间与历史。当然,个人诠释的故事及其人物形象的刻画,大都来自作家平日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是客观的。问题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他的个人诠释,如小说它所必备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之客观构成要素外,还必须要发自作家在创作时突然奔涌的源自心灵内在的正直之思,在精魂高蹈的状态下,以一种将自己的生命原质与客观描述事物合成一种岩浆,喷发出令读者敬畏的高度。而这个合成不可或缺的正是历史范畴中的政治,可我们的作家,却往往有意无意在躲避政治,导致作品社会深度的不到位。由此,这个潜在于小说创作的高度内质在时下的当代文学作品中仍为鲜见,所以人们翘首期盼的纯真的当下经典之作也就迟迟未能出现。

在文化强调的转变时,我们的作品是否极其敏感,这首先是作家的创作思维是否敏感的一个问题。敏感的主体指涉不是指题材的对应,而是题材在你的诠释中,是否具有真正优于其他作家作品的高远敏感度,它既是审美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开启读者与其他作家的一个影响环点。这也因为,作家的高度敏感与社会责任性,会驱使他的作品成为一种人类良知建设的正面目标。于此,社会对优秀作家的杰出作品的认可及其关爱,也就会由此升腾起一个社会的文化热浪,这也是“文

化因素与当代场域的重要性”^①在文学作品中的现实意义。以现代人个性结构完整历史发展这一颇为热门的西方理论命题,反过来去侧视或探究文学作品与作家的关系时,我们也就不再难理解,一部作品的优劣,特别是其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的深度与高度,均在于作家自身文化素养及其敏锐观察力中折射出来的那种历史的觉察(敏悟)能力。这里还得谈到正确地对待政治的问题。李建军先生近日撰文说:“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讲,漠视政治,疏远政治,曾经是一种时髦,后来则成了一种习惯。这种‘政治冷漠症’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文学叙事的流于琐碎和浮薄。”^②此论确实一针见血,疏远政治与冷漠政治的作家及其作品,其结果就是叙事中缺失了时代全景,流失了应有的思想高度,同时也愚害了作家应有的敏锐眼力与深邃思考判断力。没有政治维度的文学作品,是很难成为一部具有社会意义与美学高度的经典作品的。

分析一部作品具有时代意义与审美价值的,还可从小小的结构层面,作家给予小说人物的行为立面,以及作家受哪个作家(几个)的影响引起写作冲动的原始创作基因团,这三个方面找出作家与作品的综合特质。在这里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因为西方哲学思潮趁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快速迈入全球化之时,现代后现代主义急速涌入,由此也便成了中国文化界争相仿效的一个热点现象。作家在现代主义火候未衰之际,便又急急忙忙顺应西方快速传入的后现代主义,一下又投入了后现代主义的角色,并以速成快餐式的学习方法,将作品完全融于简单的对后现代主义的仿效之中,即作品所表达的,是推翻毁掉从前,否定昨天,对一切现成的模式进行解构这三个方面的所谓后现代。其实,这是很隔的一个理解,也可说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误读。西方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出来,并能在理论界站得住脚,继而演化成一种文化现象,是因它自身复杂的,继承中有否定,否定中有创新的一个新的时代趋势的哲学,因此它自身也会顺应和发展着历史。

理性的接受有时也会由偏向而导致理论上的错误,从而形成因对对方的本质的误读而导致自我认识本质的偏颇化与谬论化。其实,后现代之所以能一下超越现代主义被确立起它新的理论领军的地位,主要有以下三点新势:一是福柯与德勒兹的共性在于他们与前面的哲学家们相比,自身知识的接受面更广博,而用于后现代主义中的见解理性也就更扩大化。在他们庞杂博学之中,创造了类似“知识

^① 罗洛·梅《焦虑的意义》第148页。

^② 李建军《谁能割下一磅不带血的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15日第8版。

4 文学前沿：精神与问题

考古学”、“系谱学”、“差异逻辑”、“图解法”等，特别是福柯的犯罪学、精神病学与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戏剧绘画加上政治的心理分析，简直可说是拓展了以往哲学家研究了数千年的框定的领域，对后世之学实实在在起到了启迪性的作用。^①二是德里达与迦默达尔贡献给我们的哲学方法论，开启我们的是多视角加上平等与多元对话，他们真正的意义是抛弃前辈哲学家们以己之论必否定对方之论的惯势，在展开思维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新见试图去改变（转变）对方而不是去推翻或压倒乃至灭掉对方，从而在和谐的氛围中共同达臻一个新的理论的视界，这正如王治河先生所说的，显示着的是“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②第三是格里芬注重关系中的内在构成性，同时又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与社会的广袤性（人与自然、家庭与社会、文化与人群与社会）中渗透研究，在他的时间观中，我们见到其最性感的理论意识便是“生态主义”与“绿色运动”。^③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论意识，既补充了现代意义的疏漏，又推进了后现代主义的纵深发展。所以，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三个关键词应该是“时代性”、“思想担当性”与“辨证否定”。^④这也正是我们中国当代作家所要正视并在创作中往往是困难集结的问题。

B

文学发展的内核当然在于叙事与故事。当惊悚与悬疑加点青春味的佐料成为中国文坛之领军，更有一班资深的编辑与评论家从中大加吹捧之时，就不得不让人去考虑作为真正文学之小说，它的叙事与故事应该是怎样的，这也即是本文开头所说走出旧巢的一个本质意义上的回应。

以历史（当代也即历史）与虚构、现实与梦幻交叉互进的叙事，反证出当代世界物质社会的现状与人类精神层面的多样性，甚至在正常的社会（科技与经济）发展与随之产生的不正常的戕害社会与后代之生态环境的种种荒唐、离奇，乃至残酷与变态等等，作家该以怎样的故事伸展的线索或消弭的结构去表现。以怎样的叙事立场（位置）将故事发生的场域（域外）作肉眼观察、生活体验、心灵思考，让敏感触须在叙述或者说你会以怎样的艺术创造性对现存生活种种景象作快乐与痛苦的魂的追杀与智的诠释，以作家特有的对时代的感觉的精神诉求，去凸显有别旧巢穴之文学（小说）中的叙述与故事构成，并在此中让精神之河在小说中有力流淌又波

^{①②③④} 参见格里芬《超越解构》，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版第 3、4 页，本段写作参考此书。

澜汹涌,从而既强化叙事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又能将审美(审丑)与读者之阅读意识一道搅起流动,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自觉意识——由阅读体验自觉进入到精神焦虑的层面,从中让阅读者也能自觉成为一位不同类型的当今世界精神担当者。这应该与真正的读者期盼有传世的撼人心魄的经典之作问世的意愿是相呼应的。这也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说,文学要有更高的使命,是对人心的开拓。^①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那么,叙事方式上的创新就不会仅是技巧式的匠人文学的表现,故事的显性与隐性甚至复式构成或发散消弭也非吸人眼球的钓饵,而是美学意义上的人性的自难与拷问,即是你对日常生活之习惯现状之存在的自我批判与它者批判,依此,近期热议的《人民文学》刊发的《梁庄》也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观察者的伤痛与类似皮肤表层的消毒般的慨叹之中了。因为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拥戴文学之士常常会说文学是永恒的,那么这个永恒将使文学怎样才不间断地滋生常青性,让文学真正永恒起来呢。这就涉及一个作家叙事的位置。呐喊与敲警钟是同一层面的不同方式,问题在于这些作家所看到的并在文中所反映出来的东西,到似乎与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德加·劳伦斯·多在托罗(E.L.Doctorow)的小说《霍墨和兰利:一本小说》中的科利尔兄弟借以生存的垃圾场屋相似。空气河水大肆被污染,食品被各类有毒原料奸注,大量生态资源被开采后,我们借以立脚的地层下悬着危险潜在的空洞,高喊进入高铁时代,但高铁巨魔似的冲击波将会给这世界带来怎样意料不及的危害等等,这些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多么像越积越厚,越堆越高的垃圾,将都市与乡村以及主宰它们的人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中,而面对这些,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成了多克托罗笔下科利尔兄弟中的瞎子哥哥默霍。剩下的也许也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为垃圾的收储者与守护者。面对垃圾之山的发难者与搬运者又在哪里?我想,真正的作家不应该只是以笔参与搬运、唤醒人麻木神经的保洁工!只有这样,文学在这里才会自觉见出永恒来。所以叙事方式与故事构成不在于新奇,而在于精神的深度开掘中。这也是接续中国传统文化之“道”与“善”的当然的脉冲之点。

叙事与故事,还涉及一个作家与文学本身的关系。

当作家以作品作为文化记忆来进行创作时,他以历史再现的隐性特殊身份与之文学的关系也就同时存在了。历史的再现并非就绝对是历史的真实,文学的虚构更给历史的真实有了多元的当下性的再现,所以,唤起读者想象的重构,就又形

① 见《文学报》2011年1月13日“对话”版。

成了作家、文学、读者三重关系。在多元的维度里，一切都是发展的，而发展之深刻，就在于文学展现的比历史存在的更为深刻。用伍尔芙的话来说，是“真而不实，虚而不伪”。^① 在这里，我关注的不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是第二性的，或者是文学比历史更真实^② 等，我所关注的是文学创作在历史之中或之上的状态^③。当然它也不是希罗多德《历史》中所暗示的：文学与历史——在纵向上它是历史、在横向它又是文学。我以为，文学创作在已有的历史之中或之上的状况，即文学创作在占有和回顾历史或面对当下发生与正在发生的事件时，作家与他的作品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存在的状态，也可说是作品与作家同时展现在社会与读者群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新高貌。在这里，状态就是一个现象，也是一个关系现象学的理论话题。

状态首先涉及当今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至今未能产生巨著，关键的一点在于作家想象力的贫乏。当然不能说当代文学之于作家的想象力是脑贫血，但想象力之不饱满是众目所证的一个事实。当然，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不缺乏想象力，我在这里是一种特指，它指的是中国当代作家给自己文学作品中增加含金量的自由的想象力。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统”数千年对文学与作家的深入骨髓的侵蚀，使得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皇家的惯性已成为文学历史之链上的润滑剂。更由于清朝“文字狱”之遗毒与中国当代“反右”、“文革”之三大淫政的戕害，已使中国作家在整体上已充分表露出了自由想象力的蜕化。在一些庞大的口号与形上舆论的引领下，与现实对峙的、滋生复杂多元视角的、思考在动态中行进的、超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现状关系的、与自我为中心为世界进行经常性诘难的、跳出狭隘个人与个体民族主义的等等能给力于文学的诸多因素，均给一个简单化的历史性的习惯性思维予以消解吞没。更使得已有想象生机的作家无法让想象向纵深发展。其实想象力的所指也非内中一定要含何种广阔博大的元素，而在于作家自身想象展翅的起飞之点，一定要克服自我局限，以自由、独特、超越的精神，努力走出专业教化类的习囿，通过非平常的思维与想象去扩展自己的新想象空间中，去努力寻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现有差距，在他者的文化陌生中感悟出新认识，以提升刻画的视域。将描绘的现象通过文字语言的独特性，转化为人类内心在不断寻求，不断澄静又不断攀升的人文需求，进而成其永远没有句号

^① 吴庆宏《〈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刊《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116页。

^{②③} 同上，第117页。

的对人类心灵探索的一份终极关怀。

C

黑格尔曾有时代精神一言,用与时俱进的学说来理解,时代精神其实就是即时现代性。说文学是永恒,就缘于这种现代性予文学的不断介入。就作家的创作而言,我以为,现代性首先是作家对待现实存在的一种理性,也是他在作品中渗入和表达对社会现状的思考与理解。批评家的介入,让文学作品具有更多的复杂性,仿佛艺术上又集结了宗教(批评家之所以批评,他的立足点在于文学作品是一种信仰的神圣之物)的元素。它虽然有追杀之情状,但却是在这情状中将文学在人的心目中成为信仰的珍品。由批评家去检验,便是我前面所说的,是一种“状态”,它是作家用灵魂与生命去求索世界的一份文学的真实。由此可见,“状态”还包括了作家与自然与社会的个性化的对话、冲突,甚至决裂与寻找新的和合。它既是形式的,又是本质的。在“状态”中凸显出来的,在吟唱中更多的应该是对传统中杂入的政治干扰,对当下经济发展与高科技发展中产生出危害当下与后代的现象,勇敢大胆地加以质疑与拒绝,而不是放纵地歌唱。由此,讲一个作家要出杰作,首先在于超越自我,才会成为可能。一个时代的杰作,与一个时代真正的文明降生是一样的,它必然伴随着阵痛与创伤。变化与超越,创新与毁灭,这就是作家与文学的关系的真正所在。

中国当代文学令人焦虑的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作品生命的质感与它的时代性格,同样与想象力共同构成了对当代中国作家发展的威胁。写下这几行字,让我马上想起刚读过的《南方周末》上的《十年春运:一部好莱坞大片》,它的文字与图片(2011.2.10)。记者王轶庶把它归结为“人类、人民、人生”三个关键词,令一些现在仍在文坛上光彩鲜艳的作品顿时黯然失色。试问,我们每年出版的几百部长篇小说中,有哪一部集这三个关键词,能成为一部深度追问人性,广度倾听呼吸,并与人类普遍生存及生活权益等诸多尖锐问题有矛盾“瓜葛”的“好莱坞”大片式的令读者心灵大为震撼的沉甸甸的大作?就人生而言,全景式地反映外出打工者之外在与内里世界的林林总总,并像当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能在“春运”现象上展开问题的挖掘与形形色色世相的对应,以艺术的手法对春运现象外延之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诸如春运购车票等细节,包括某文娱晚会上打工子弟演出时说:“老师问我们长大了做什么,有的同学说,要当科学家,有的同学

说,要当大明星,可我,却毫不犹豫地说,要当“城管”,好让爸爸再摆小摊时,追他时不那么用力”这样的台词作文学的细节相辅。又像当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描绘战争大场面那样全方位立体式地置景展现,以及春运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深层含义。可叹从中创造出永垂历史的典型事物与人物,竟是那么地千呼万唤出不来,症结何在?假若我们在读作品的时候,能读到生活汇集在这里的巨大的热量,能在小说的叙述中,瞥见我们自身的局限所不能看到想到的更深层的东西,从而能再次进入与作家创作时激情加高度理性的状态,作真切的主体思考与批判,随着叙述进入迷茫、被扭曲、疑问与之后来的一次真正的审美(丑)清醒,那么,小说生命的质感就会自然地流到读者的心里。

时代的性格不是简单的去印证时代曾经出现的一些事物与现象,也不是将人物性格或作品的特性硬硬地往时代特征上镶嵌。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产生新语言的时代,产生多元思维的时代,产生走向全球化的孵化新异与思想的时代。当然更是能够产生独具只眼与独立个性人物的时代,这一些,综合成了既是现代意义的,又是后现代主义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及随之化出的颠覆性、焦虑性与这故事与非故事折射出来的时代性。与生命的质感与时代性格直接相关的带连出来,还有作家创作的心理状态这么一个可能的插曲。如果说福柯曾经认为重要的不是疯癫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会是什么样子,而是在这个世界能够做些什么,即疯癫必须被视做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①由此引申,我以为中国当代作家也缺乏疯癫(或疯狂)式的创作。他们往往只是冷静地去刻划一个心灵已几经琢磨的故事,或虽曾经激动,但其时为写小说,已经脱身于激情之外,当然我并不是想让优秀作家的创作一定要处于疯癫的状态,而是说创作中他必须有潜在的这份因素在内,并由此生出笔下具有时代疯癫性质的人物。事实上,除了当代中国作家笔下随着作品创造出成千上百个人物外,真的还缺少那么一个或几个傍依文明与高科技的发展背景成长,站在经济发达已走在世界前列,但还存在巨大贫富差异的土地上生活,头顶在高喊全球化,脚底在呼唤国学热的发展与变化,升腾与变异之中产生出的一个复杂至极又典型得很的人物,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浮士德,那种作品中既有我,又非我,更是本能的我,又是超越的我之复杂多层次多重性格的人物。那种在叙事中营造气氛,气氛中凸显出日常又别一样场景的三维多样性与复调结构成的生发真实时空与想象时空的作品和作品外的非一般意义。但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似乎

^① 罗伊·博伊恩《福柯与德里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6 页。

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或许在他们的作品里能看到晨曦冉冉升起的清爽，能听到山泉淙淙的流声，能闻到穿透最后的雪痕融出的春气，能感受深夜静穆中空气与暗色相互杂入的那份缠绵。但我们在他们的作品里听不到大海辽阔的笑声，看不到奇峰力拔蓝天的韧力，嗅不到狂风隐藏在平和空气中潜行的影踪，感受不到战争与和平在当下性中的变幻的玄魔。大气，荡涤宇宙的大气，雄浑，震撼山河的雄浑，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不正是大气与雄浑么。

与生命的质感和时代性格相关的，还在于文学在歌唱生活的同时，还应该真实而非作秀地袒露生命与灵魂的伤与痛。于此，小说是向生活提出疑问之毛姆文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斯旦达穆尔对小说的观点，^①尤应引以中国当代作家借鉴。王德威先生也曾说过文学话语“通过思想、欲望和行为的现存模式的深化、重复、扭曲来展出前所未见的意义。它就这样盘旋着，卷向自身内部。”^②若引申地诠释，那就是小说内在的作家的思想，社会诸多层面诸多人物的欲望，历史的与现在的甚至将会带出未来的各个阶层的人之为人的行为，在小说情节，故事建构与解构、人物语言的刻画、宏大叙事的社会场景、细节描述的精澄剔透，与之人类与社会共建的生存模式之中随着写作的纵深发展中，而生发的深化、扭曲、重复的生活真实又从文学的虚构中去反映从未中断过的人间悲剧。这里，文学作品是在美学（审美）的指引下自觉承担起社会担当而给力于读者的灵魂。文学作品是作家个人的，但更多作品它又是社会的，是社会群体的精神滋补品。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社会，它更需要就是在哲学的明训导理之下，由文学以艺术语言的独特魅力，给予社会的良心，道德和劝议，并且，它自身也像柏拉图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又是助政者三重身份那样，在逐出诗人之“理想国”中，于城邦更大的矛盾和更深的意义。伟大的生命在文学的创造性体验中，更显得美好与高尚，同时也会被揭露得更丑恶更卑贱。它使人们感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现实，可是我们又有更坚定的信心相信生活。这就是小说在以它自身的特性诠释柏拉图绵延数千年的“理念”。2010年略萨获诺贝尔文学奖，它使我们油然又忆起关于拉美文学风格的争论问题，即拉美文学风格是扎扎实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略萨），但它同时又是“非常魔幻”的（马尔克斯）。在魔幻之马尔克斯沉寂之后又升起“结构现实”的略萨，这中间几乎让当代中国作家既惊诧不异，又有点茫然无措，其原因正如《文学报》记

^① 《文汇报》2010年12月31日第5版。

^② 王德威《天启的意义在于塔的倾覆》，刊《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16日第6版。

者傅小平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与此同时，略萨涉笔的题材也几经变换。它们虽背景各异，共通的是略萨回到历史的脉络中，用更深沉也更平静的心境审思群体的命运，思考个体抵抗的力量和意义。基于此，拉美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表示，尽管马原、苏童、余华等先锋派作家，深受略萨小说叙事的影响且多有模仿，但他们或许都太早也太轻易地丢弃了对生存、社会、人性的倾注。略萨坚持不懈的“结构现实主义”并非是一种单纯写作技巧，他同时提醒我们，如何更深切地关注他们生存的世界，如何介入当下，如何用想象力穿透生活而绝非简单地复制生活……^① 可见，令中国当代作家小我的，恰恰正是简单地理解略萨的创作经验，忽略（缺乏）的，又恰恰是略萨自己死认的最宝贵的经验：从不忠于自己的经验，不断在创作中修改这些经验！

追寻生命的那份纯真，是每个作家创作过程的信念必然。所以，真正的文学作品决不是比技巧比形式，最后滑向制作工艺的类辙，“作为人的精神存在的方式，文学提供给人的应该是灵魂的关怀和诗性的拯救”^②，它也不应该“堂而皇之地让精神向感觉退守，诗性向物性退守”。^③ 以小说为例，折射时代的焦虑，担当后现代之后悲剧时代的人文关怀，揭示生态危机与精神的堕落，剥离后现代之怪异种种，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深度与厚度。这也就要我们明智地认识到，“缺乏厚度的文学是难以为继的”（王安忆）。

它同时也让我们想起略萨在获奖当天说过的一句能警示一切作家的那句话：“这是对拉美文学的承认，它提醒世人，南美不只有军政府、暴政与苦难，这里还有文学和艺术。”^④

写于庚寅末与辛卯初之际

① 傅小平《略萨·文学是表达生活的一种方式》，刊《文学报》2010年10月14日第4版。

②③ 汪涌豪《向物性退过，是否找错了文学的方向？》，刊《文汇报》2010年6月24日第5版。

④ 转引自《文汇报》2010年10月16日《文汇周末·书缘》C版。

目 录

- 1 焦虑与期待（代序）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识与求问

第一辑 前沿的诘难与问题批判

- 3 当代文学的前沿思考与作家自身的超越
8 当代文学，在挣扎中抓住希望
——被指责后的深层思考
13 边缘的新声与立场的功能
——对当今小说创作的思考
18 当下的新诗，失落在哪里
26 当诗歌被作贱时，就不再是诗
31 诗歌的纯美与理性担当
36 个性的独立申张与快乐的自由自慰
——对当代中国网络诗歌的浅见
44 你的眼光朝哪看
46 深情敏识翥文学
——文学创作，请关注美与当代生活的新现象
49 当代批评：精神和审美的失落
54 文学艺术：创造与生产的时代认识
——兼谈对本雅明的理解与批判
66 远离社会和民众的玫瑰花
——诘难“纯文学”

2 文学前沿：精神与问题

- 69 手绢——基层作家与批评家的眼光
——兼述赫塔·穆勒的手绢说及与基层作家的关系
- 73 悲剧 生活世界与现象学
——以熊元义《中国悲剧引论》为例
- 84 新武侠小说行演的价值与意义
——金庸武侠小说五论
- 92 金庸及其他武侠人物的文化含义
——以《天龙八部》之段誉为例
- 102 武侠的梦还会做多久
——金庸武侠小说的社会阅读分析

第二辑 审美介入与当代境遇

- 113 时代·徐志摩诗·悲剧
- 126 徐志摩对两性和谐的追求
——纪念诗人徐志摩诞辰 110 周年
- 130 陈学昭文学作品的当下意义
——纪念陈学昭诞辰 100 周年
- 137 生命不在骨架的承载
——论沙可夫的戏剧创作
- 145 掷与江潮万古鸣
——试论吴世昌先生的学术思想、方法和意义
- 156 穆旦诗歌中不存在宗教意识
——纪念诗人翻译家穆旦逝世三十周年
- 167 穆旦——将自身放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思考与创作的诗人
- 171 以新的视点审美殷夫的百年之作

第三辑 个案视野中的文化美学

- 183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哲学问题
- 193 小说文本的两次阅读
——以余华的《活着》为例

- 200 洞穴的存在与鹰眼的穿透
——海桀小说初评
- 204 挣扎的努力
——卑愚小说作为一种文化的简释与反思
- 210 苍凉中的温暖
——评李森祥、薛荣的长篇小说《送瘟神》
- 216 诗歌研究的原创性力作
——沈健《浙江先锋诗歌 14 家》简评
- 220 段誉奇特个性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之比较
- 233 个体生命与社会关系
——段誉的佛性及五大修炼分析

第一辑

前沿的诘难与问题批判